

经济学季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论文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汤玉刚、苑程浩：不完全税权、政府竞争与税收增长

李成等：通胀预期、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

许志伟等：融资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

余壮雄等：FDI进入对我国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

孙晓华 田晓芳：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

张自然：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卢远瞩：同质市场中的默契合谋

王兰芳 王苏生：公开市场信号和创业投资

刘晓峰 曹华：“肥猫”、股价与市场均衡

李晓义等：首位晋升与末位淘汰的实验比较

马双等：合作医疗与食物消费

史青青等：人口红利与房地产收益率

吴一平 芮萌：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犯罪率

邢春冰 李实：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

李强 臧文斌：留守儿童的健康

经济学季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经济学》(季刊)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经济学学术刊物,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出版。本刊采用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发表原创性的理论、经验、综述和评论性的中文经济学论文。本刊倡导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鼓励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提倡学术批评和交锋。发表于本刊的论文无须针对中国的问题,但特别欢迎对中国转型和发展现象的实证研究。

主编:姚洋

副主编:朱家祥 汪浩

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毅夫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白重恩	清华大学	宋国青	北京大学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陈抗	南洋理工大学	谭国富	南加州大学
陈平	北京大学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汪丁丁	北京大学
管中闵	台湾“中央研究院”	王江	麻省理工学院
海闻	北京大学	王一江	明尼苏达大学
何梦笔	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	文贯中	三一学院
洪永淼	康奈尔大学	许成钢	伦敦经济学院
黄季焜	中国科学院	易纲	北京大学
黄有光	蒙纳士大学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稻葵	清华大学	张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	张军	复旦大学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
林毅夫	北京大学	张维迎	北京大学
刘德强	京都大学	张新	中国人民银行
刘民权	北京大学	周林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	朱敬一	台湾“中央研究院”
卢锋	北京大学	朱晓冬	多伦多大学
麦朝成	台湾“中央研究院”	邹恒甫	世界银行
茅于軾	天则经济研究所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
舒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主管单位:北京大学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主任:朱启兵

主编助理:杨洪艳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

电话:62758908

传真:62751474

电子信箱:ceq@ccer.pku.edu.cn

主页地址: <http://ceq.ccer.edu.cn>

经济学季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经济学》(季刊)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经济学学术刊物,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出版。本刊采用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发表原创性的理论、经验、综述和评论性的中文经济学论文。本刊倡导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鼓励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提倡学术批评和交锋。发表于本刊的论文无须针对中国的问题,但特别欢迎对中国转型和发展现象的实证研究。

主编:姚洋

副主编:朱家祥 汪浩

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毅夫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白重恩	清华大学	宋国青	北京大学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陈抗	南洋理工大学	谭国富	南加州大学
陈平	北京大学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汪丁丁	北京大学
管中闵	台湾“中央研究院”	王江	麻省理工学院
海闻	北京大学	王一江	明尼苏达大学
何梦笔	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	文贯中	三一学院
洪永淼	康奈尔大学	许成钢	伦敦经济学院
黄季焜	中国科学院	易纲	北京大学
黄有光	蒙纳士大学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稻葵	清华大学	张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	张军	复旦大学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
林毅夫	北京大学	张维迎	北京大学
刘德强	京都大学	张新	中国人民银行
刘民权	北京大学	周林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	朱敬一	台湾“中央研究院”
卢锋	北京大学	朱晓冬	多伦多大学
麦朝成	台湾“中央研究院”	邹恒甫	世界银行
茅于軾	天则经济研究所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
舒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主管单位:北京大学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主任:朱启兵

主编助理:杨洪艳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0871)

电话:62758908

传真:62751474

电子邮箱:ceq@ccer.pku.edu.cn

主页地址: <http://ceq.ccer.edu.cn>

《经济学(季刊)》刊号说明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经济学(季刊)》获得连续出版物刊号,中文刊号为 CN 11-6910/F,国际刊号为 ISSN 2095-1086,自第 10 卷第 1 期(2010 年 10 月)起执行。感谢各位作者、匿名评审人、读者和其他同仁一直以来对《经济学(季刊)》的支持和厚爱。欢迎继续投稿和订阅本刊。

《经济学(季刊)》

2010 年 10 月

经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第 1 期

(总第 39 期)

2010 年 10 月

目 录

论 文

新结构经济学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林毅夫 / 1

不完全税权、政府竞争与税收增长 汤玉刚 苑程浩 / 33

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稳定

..... 李 成 马文涛 王 彬 / 51

融资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

——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的动态分析 许志伟 薛鹤翔 罗大庆 / 83

FDI 进入对我国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 余壮雄 王美今 章小韩 / 111

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

——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 孙晓华 田晓芳 / 133

考虑人力资本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张自然 / 153

同质市场中产量匹配惩罚策略下的默契合谋 卢远瞩 / 169

公开市场信号对创业投资决策和绩效的影响 王兰芳 王苏生 / 183

“肥猫”、股价与市场均衡：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峰 曹 华 / 209

首位晋升与末位淘汰机制的实验比较

..... 李晓义 李维安 李建标 郑巴音 / 227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

影响分析 马 双 臧文斌 甘 犁 / 249

人口红利与房地产收益率的无关性 史青青 费方域 朱微亮 / 271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 吴一平 芮 萌 / 291

中国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1995—2007 邢春冰 李 实 / 311

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 李 强 臧文斌 / 341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10 No. 1

October, 2010

CONTENTS

Papers

-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Reconstructing the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ustin Yifu Lin 1
- Incomplete Tax Rights,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and
Tax Growth Yugang Tang and Chenghao Yuan 33
- Inflation Expectation, the Selec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s
and Economy Stability Cheng Li, Wentao Ma and Bin Wang 51
- Financial Constraint and Chinese Business Cycles: A Dynamic
Analysis in the New Keynesian Framework
..... Zhiwei Xu, Hexiang Xue and Daqing Luo 83
- The Effect of FDI on Regional Capital Flows in China
..... Zhuangxiong Yu, Meijin Wang and Xiaohan Zhang 111
-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a Two-sector Model Xiaohua Sun and Xiaofang Tian 133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with
Human Capital Ziran Zhang 153
- Tacit Collusion with Quantity-Matching Punishments in
a Homogeneous Market Yuanzhu Lu 169
- The Impact of Public Market Signals on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Performance Lanfang Wang and Susheng Wang 183
- Fat Cats, Prices and Market Equilibrium: A Theory
..... Xiaofeng Liu and Hua Cao 209
-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between Winner-up and Loser-out
Tournaments Xiaoyi Li, Weian Li, Jianbiao Li and Bayin Zheng 227
- The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on Rural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 Shuang Ma, Wenbin Zang and Li Gan 249
- Irrelev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s and Real-Estate Equilibrium
Returns Qingqing Shi, Fangyu Fei and Weiliang Zhu 271
-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Crime Yiping Wu and Meng Rui 291
- Within-Group Wage Inequality and Its 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Chunbing Xing and Shi Li 311
- The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Qiang Li and Wenbin Zang 341

新结构经济学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林毅夫*

摘要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刚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时,结构主义的观点占主流,认为经济结构外生决定,强调市场失灵及政府在改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

一、引言

2008年秋季源于美国金融业部门的国际金融危机,无论就其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幸免于难。2009年,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萎缩,世界GDP下降了2.2%,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14.4%的惊人速度下降,是8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World Bank,

* 世界银行。笔者在2009年6月2日担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家研讨会上阐述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其缩减版本曾发表于2009年10月19日至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论文初稿则分别于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9年10月15日在伦敦英国国际发展部,2009年11月5日在开罗大学,2009年11月16日在日本JETRO研究院,2009年12月8日在巴黎OECD总部,2009年12月20日在韩国发展研究院,2010年1月19日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院(UNU-WIDER),2010年1月21日在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院等处进行了公开报告和研讨。Celestin Monga为本文的准备提供了许多帮助;本文也同样获益于Gary Becker, Otaviano Canuto, Ha-Joon Chang, Luiz Pereira Da Silva, Augusto de la Torre, Christian Delvoie, Asli Demirgüç-Kunt, Shantayanan Devarajan, Hinh T. Dinh, Shahrokh Fardoust, Ariel Fiszbein, Robert Fogel, Alan Gelb, Indermit S. Gill, Ann Harrison, James Heckman, Aart Kraay, Auguste Tano Kouame, Norman V. Loayza, Frank J. Lysy, Shiva S. Makki, William F. Maloney, Mustapha Kamel Nabli, Vikram Nehru, Howard Pack, Nadia Piffaretti, Claudia Paz Sepulveda, Martin Ravallion, Mohammad Zia M. Qureshi, Sergio Schmukler, Luis Servén 和 Harald Uhlig 等学者的评论。最后感谢易声宇和邢亦青同学将此文翻译成中文。

2010)。在危机发生前,世行曾估算,2005年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的人口为14亿;据预期,这场危机将使得6400万人在2010年年底失去了脱贫的机会,他们中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远比危机本身更加持久。¹

然而几十年后,当经济史学家回首过去百年历史,他们或许会对不同国家之间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之谜更感兴趣,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来说则尤其如此:一方面,他们会为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毛里求斯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在短短一二代人的时间里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数以亿计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农业人口迅速脱贫,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实现的成果,而感到异常惊讶;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为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扭转命运,占世界总人口1/6以上的十多亿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陷阱(这一部分人口被Collier(2007)称为“最底层的十亿”)而感到揪心和费解;他们还会注意到,即使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种发展机构也施以多方援手,但直到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踪迹,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因杰出的发展绩效成为例外。²

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理论进展,但作为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对于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能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它迄今仍显苍白无力。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反思现有理论,开辟新研究领域的绝佳机会,这种努力不仅有助于帮助发展和发达国家共同应付当前危机的挑战,预防类似危机在将来出现,而且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快速的、可持续的、普惠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致力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回顾了自二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理论和政策思潮的演变历程。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洞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称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¹ 针对历次危机的实证研究表明,营养不足的幼儿在发育上可能永远无法赶上在经济较好时期出生的同龄人。在印度尼西亚,1997年后贫困人群的入学率下降了许多,其农村地区7—12岁孩童的失学率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成倍增加,升至12%。危机也会响健康水平:在危机中婴儿死亡率的增幅超过3个百分点。

² 根据“Growth Report”(World Bank, 2008),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25年以上每年平均7个百分点或更高的增长率的绩效,成为新兴的中等甚至高收入经济。

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由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由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包括“硬性”和“软性”）³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⁴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给定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处于任何一个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水平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任何一个企业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并且，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置的改进，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法，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政府干预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政策制定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³ “硬性”基础设置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系统等；“软性”基础设置包括金融体系、管制、教育体系、司法体系、社会网络、价值体系及经济体中其他无形的结构。

⁴ 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基础设置充足、完善与否，作为其他条件之一，影响着实际生产是否真正在边界上进行。

本文以下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并对其主流思潮给出批判性评论；第三部分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性框架，包括市场的基本作用、因势利导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以及干预和扭曲的退出战略等；第四部分仔细比较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初步启示，讨论重要的政策议题；第五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二、对发展经济学思潮和经验的简要回顾⁵

以持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持续增长，是一个现代以来才发生的过程。从亚当·斯密时代直到20世纪初，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实现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佳途径。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资源配置的所有决策都由经济个体在相互作用的市场中做出，且不受政府的任何干预；价格体系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而且还决定为谁生产。家户和企业为了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就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领那样，实际从事着为他人和社会总体谋福祉的工作。尽管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自由放任市场的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分析框架。虽然它对经济发展过程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这个框架忽视了连续而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使现代经济增长区别于前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特征(Kuznets, 1966)。

政策制定者总是为经济发展这个过程而着迷，试图弄清楚究竟怎样的机制才能最好地组织起一国的资源和制度，以获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有序而合意的社会进步，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所谓的“发展经济学”却是自Rosenstein-Rodan(1943)将“发展”这个议题引入经济学前沿的讨论后，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Bell, 1987)。在那篇文章里，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本上取决于个体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市场容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只有当市场规模足够大，以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生产率优势能够弥补更高的工资时，现代生产方式才会比传统方法更有效率。然而市场规模本身却取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采用程度。因此，如果一开始现代生产方式能够以尽可能大的规模被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通过自我加强而呈现良性循环的持续增长结果；反之，经济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停滞。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想法出现(Chang, 1949; Lewis, 1954; 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这些被统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向贫困宣战的这套方法最突出的时代背景莫过于大萧条和

⁵ 此处的前四段话是基于Lin(2009a)的修改而得。

前苏联成功工业化这两个历史事件，以及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这股当时的主流思潮；而其出发点则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和协调失灵，现代重工业无法自动发展起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市场失灵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⁶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加之对前苏联的经济成功深信不疑，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主流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包含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必须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帮助作用。当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支持政府通过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抢占战略制高点”而在大机器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Hirschman, 1958; Nurkse, 1953; Rosenstein-Rodan, 1943）。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直接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经济窘境、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和 Prebisch (1950) 及 Singer (1950) 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

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主权国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随之蔓延。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很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却较高，民众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落后，产业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国内所消费的绝大部分制成品都依赖进口。在这种状况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试图独立地发展其国内经济，以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摆脱贫困。

虽然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于究竟执行何种具体政策才能最终跳出贫困陷阱、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却仍各执己见。Rosenstein-Rodan 倾向于将大推进（相互衔接良好的大型政府投资规划）作为解决之道。Nurkse 也看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只有同时进行一系列新投资，才能创造出所需要的足够需求；在他的“平衡增长”理论中，资本稀缺被认为是制约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而发展在他那里则主要指市场扩大、生产增加。包括 Hir-

⁶ 这个新的发展经济学领域被认为是涉及了“欠发达”的内涵，因为“传统经济学”在此方面不大适用（Hirschman, 1982）。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和前提假设是早期贸易理论、发展理论及政策建议的基础（Krueger, 1997），包括：（1）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结构常极其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2）若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永远处于初级产品生产；（3）初级产品全球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4）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关键要素，但在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资本品的进口发生。基于这些典型事实和前提，经济学家很自然地相信，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替代进口加工产品的国内生产又是工业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Chenery, 1958）。

schman在内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关键限制条件并非资本的稀缺,而是企业家才能的稀缺,而这种稀缺正是发展中国家制度条件的反映;他们由此认为,应该采取一种“非平衡式的增长”,即投资不应平均用力,而应集中于经过仔细挑选、具有较强产业前后关联度的关键产业部门。总之,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而一些多边组织,例如世行,也在为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方案中融入了这些结构主义的思想。

然而,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却适得其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求持续经济增长而不得,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完全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⁷为了贯彻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只好对重工业部门中所建立起来的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予以大量保护补贴,但受财政资源和税收能力所限而无法持续,于是只好借助诸如赋予企业的行业垄断权力、压低利率和原材料价格、高估本国货币等行政手段来降低这些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因而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的普遍短缺;为了在短缺状况下保证资源会流向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来实现行政直接控制和配置资源,而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采用信贷控制、投资和行业准入等措施(Lin, 2009a; Lin and Li, 2009)。⁸

保护这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他成本:(1)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世界的价格,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使得经济过少地消费了这些产品;(2)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联系广泛;

⁷ 一些重要的理论支持“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的战略。著名印度统计学家 Par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 在 1953 年建立的经济发展模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成为了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理论基础(Bhagwati and Chakravarty, 1969);又如 Amartya Sen 在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后来在 1960 年成书发表)也提出同样的理论。

⁸ 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介入和扭曲,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假说。Olson (1982), Acemoglu *et al.* (2001, 2002, 2005),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6, 2001) 以及 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的模型认为,政府介入和制度扭曲源自有权势的特殊利益精英阶层对政府的控制。逻辑上看,他们的理论可以对一部分观察到的介入和扭曲给予解释,包括进口配额、税收补贴、进入管制等。但是,对于另一些重要的介入和扭曲却无能为力;譬如,在发展中国家无处不在的国有企业是与权贵精英的利益相悖的,以及为何保护工业部门的绝大多数政策扭曲都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引进,而在那个时代权贵精英大都是地主阶级。然而,即使是源于好的动因,一旦政府引入了扭曲,一群特权阶级就会被创造出来。特殊利益集团的假说或许更适于解释何以扭曲难以消除。

(4) 管制带来寻租腐败，进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 (Krugger, 1974)。⁹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无不对曾经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发生铺平了道路。理性预期理论则进一步驳斥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断。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些国家趁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举借债，其借债总额甚至远远超过了其还款能力。当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后，拉美债务危机终于在1982年爆发了。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为占世界相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 (Cardoso and Helwege, 1995)。于是，多边借款机构及其以美国为主的主要债权人纷纷借此机会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全面改革，循着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教导，转而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后来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Williamson, 1990)。

最后，在80年代末期，被 Francis Fukuyama 称为“历史的终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强调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对阵中完全胜利。当时，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注定失败，因为干预不仅使资源配置、供给和价格不可避免地被扭曲，而且还使经济主体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他们声称，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崩溃、拉美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频发，无不说明，政府永远不应试图领导并推动工业化进程。这些看法不仅进一步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胜利，而且也成为华盛顿共识中有关发展议题的中心思想。

虽然华盛顿共识最初仅被视为“对大多数在华盛顿的人关于拉美（并非所有国家）在1989年（并非任何时候）该如何作为的各种主张的总结”，但它迅速被认为是“驻扎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组织强加给无助国家，并致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 (Williamson, 2002)。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执行一套严厉的、旨在稳定经济的方案。然而其绩效就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来说即使不是不尽如人意，也是可争议的 (Easterly, Loayza and Montiel, 1996; Easterly, 2001)。

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逐渐褪色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盛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同时目睹了以跨国回归实证研究方法寻找经

⁹ 参照 Krugman (1993) 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性阐释。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时代的终结,这个方法重点分析多个增长决定因素的独立和边际的效果。这个方法导致了复杂经济模型的线性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增长决定因素是相互作用的,若想取得成功,一项政策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直接从回归模型所导出的政策方案并不能产生合意的结果。

一个替代的非线性观点是由 Hausmann, Rodrik and Velasco (2005) 提出的增长诊断或者决策树方法。他们认可了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并认为不同国家面临各自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binding constraints);这就意味着,即使其他领域的改革是成功的,未能解决关键领域“约束条件”的改革政策,仍然将阻滞经济的增长。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些约束条件因时因地而异,因而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找出这些约束条件。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分析框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政府难以对所有方面都进行改革,同时也强调了需要依靠经济中影子价格所反映的信息来为改革排定各个方面的先后次序。

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预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收敛,但事实上却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政策处方与(或)对其效果预期的错误;另一些人则指出经济增长的研究者忽视了国与国之间的异质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跨国分布可能是多形态的(multi-modal),即存在“俱乐部收敛”,但这仍未解决关于经济增长研究新方向何在的争论。人们又开始回头审视许多基本问题: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寻求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时是否找错了地方?是否比起政策或者在关注政策的同时,更应该集中注意力于制度(或制度结果)?此外,如果它们体现的不是别的因素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合意的制度结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在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度变迁或外国援助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形成以家户和企业的微观行为为基本对象的研究范式,以试图做到两点:(1)允许经济中(国内和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2)弄清楚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如何具体作用于微观层面。

国际援助的绩效也越来越令人失望,人们开始不再对援助绩效抱有幻想,并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室(MIT Poverty Lab)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了一种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RCT)或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s)的研究发展的新方法,试图达到“以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政策来减贫”的目标。尽管随机化控制试验对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颇有帮助,但它们往往不是从如何填补我们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识空白的策略性评估为出发点来进行研究(Ravallion, 2009a)。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话题为对象,对于政策制定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迸发的无心产物。

最近的微观实证研究的确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诸如投资周期对企业绩效 (World Bank, 2005a)、家户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 (Rosenzweig and Wolpin, 1985) 等重要问题; 但是, “发展经济学如今的大部分研究, 其领域过窄且 (或) 一般性意义过少, 对于扶贫、促进结构变迁和经济持续增长益处甚微” (Ravallion, 2009b)。

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经济发展情况总不尽如人意, 但也的确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值得更为仔细的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转型时期, 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绩效的显著差异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一方面, 遵循着曾普遍流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拉美、非洲、东欧和亚洲各国都未能很好地提升其经济结构, 也未能缩小它们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那些旨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竞争以推进本国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政策, 反倒成了高关税、紧配额、严限制的外贸, 以及寻租、扭曲和各种经济低效率的祸根。

另一方面, 新兴工业化经济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则没有采用进口替代政策, 而是采用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使得它们从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进行了迅速的产业升级,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无论在经济结构还是收入水平上都已相当接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此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像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这些内向的、国家管制的经济体, 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采用依据自由市场—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休克疗法”这个药方, 而是逐步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过渡, 也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 就像自由市场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和华盛顿共识所预期的那样, 市场无不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但同时, 正如凯恩斯理论和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样, 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研究结构变迁的新古典框架

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吸收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让我们来提出一个新的思想框架。基于经济学理论和过去的经验, 本节将提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¹⁰

¹⁰ 笔者把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早期贡献 (如 Prebisch (1950) 和 Furtado (1964, 1970)), 以及最近的成果 (如 Taylor (1983, 1991, 2004) 和 Justman and Ben Gurion (1991)) 称为旧结构经济学。他们认为新古典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于存在结构刚性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 这些刚性来源于政治权利的分布、因垄断而扭曲的价格信号、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错误反应、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来源于它们禀赋结构的差异, 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禀赋结构而改变其产业和经济结构。参照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一) 基本原理和概念框架

经济体的禀赋是我们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经济的禀赋在任何给定时间是给定的,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循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国的禀赋由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这些便是经济中的企业用于生产的要素禀赋。¹¹

概念上,将基础设置作为经济体禀赋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引入是有益的。¹²基础设置包括硬性(有形的)基础设置和软性(无形的)基础设置。像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力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等,都属于硬性基础设置;而像制度、规制、社会资本、价值观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都属于软性基础设置。基础设置对于一国企业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和投资边际回报。对于单个企业来说,绝大多数硬性基础设置和几乎所有的软性基础设置都是外生供给的,无法被企业自身决策所内化。其实,亚当·斯密早在他《国富论》第五卷公共设置和制度的部分,便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置都作为禀赋一同讨论;可是,基础设置却常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遗忘——例如,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没有对基础设置的讨论。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地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水平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同时所生产的产品也拥有成熟的市场。除工矿外,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多以局限在当地熟人社会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交易。生产和交易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不仅有限,而且相对简单初级。在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充裕但物质和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劳动力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才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Heckscher and Ohlin, 1991; Lin, 2003)。

位于发展水平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

¹¹ 在讨论发展的长期动态过程时,我们有必要从一个外生的或是给定的、本质的且(长期)可变的要素变量作为考察的起点。如果在一个特定时点该变量不是给定的,则它不能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若它不是本质的,则会使分析的结果不具有重要意义;若它不是(长期)可变的,则相关的分析无助于改造现实经济。而要素禀赋恰恰拥有这三个重要特性:在任何特定的时点要素禀赋是给定的;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总量决定该经济体的预算总量,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其要素相对价格,而预算总量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分析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参数。同时,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长期上)可随经济中的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而变化。

¹² 生产变量和基础设置变量的差异在于,前者的供给和需求由家户、企业的个别决策所决定的;而后者则由共同体或政府供给,而且因为需要集体行动,这种供给过程无法内化到家户或企业的个别决策之中。

结构图景。由于已完成工业化，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有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由于处于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这些高收入国家需要依靠“创造性破坏”或者说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Schumpeter, 1942; Aghion and Howitt, 1992）。试图升级的单个企业需要承担巨额的研发成本和风险，而研发活动本身所创造出来的公共知识却可能使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受益（Jones and Romer, 2009; Rodrik, 2004; 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正因如此，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通过资助大学里的基础研究、对新发明授予专利，以及提供税收优惠和其他好处，补贴单个企业的研发活动。也因此，这些发达国家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都可能完全不同于低收入国家。例如，这些发达国家适合的金融安排，是有能力动员大量资本并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而各种硬性（电力、通信、道路、港口等）和软性（规制、法律、文化价值系统等）基础设置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因为此时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和规范化的，且必须以精心设计和严格执行的合约安排为基础。

对处于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以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企业大小、水平和风险性质的分布¹³，因为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从资本和劳动力比率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提升（Lin, 2003, 2009b）。¹⁴这种提升会同时改变经济体的总预算和相对要素价格这两个影响企业生产决策最重要的变量。这一点可以借用一个由不同种商品构成经济总产出的模型来解释：其中，每种商品由资本密集度不同的技术生产；当资本越来越多、其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时，最优的决策就是生产更多的资本相对密集商品，以逐渐取代劳动相对密集商品，从而形成“倒V”形产业动态过程并持续下去，这又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飞燕模式”。¹⁵进一步，随着生产越来越资本密集，对资本和风险分担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这使得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地内生变化（Lin, Sun and Jiang, 2009）；此外，其他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会相应变化。

单个企业为了组织和从事生产，必须在企业外雇用劳动力、购买原材料并卖出产品。硬性基础设置，诸如高速公路、通信、港口和电力设施等，将决定企业从事买卖活动的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正如斯密1776年所说的，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决定劳动分工程度）；而软性基础设置也有类似的作用，例如金融管制决定着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法律系统决定着合约签订和履

¹³ 在现实中，由于存在运输成本、社会分工、国家间的技术差异等，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不成立。因此，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中，相对要素价格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要素禀赋。

¹⁴ 在前现代时期，劳动力与土地的相对比例的变化是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驱动力（North, 1981）。

¹⁵ Akamatsu (1962)和Chenery (1960)等文献记录了这种模式，后由Ju, Lin and Wang (2009)正式进行了刻画。